

專輯論文

# 族群之界與折衷策略：數字社交網絡 對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影響研究

王雨菲<sup>a</sup>、張寧<sup>b\*</sup>、朱曉宇<sup>a</sup>

<sup>a</sup> 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南京市，中國大陸

<sup>b</sup> 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市，中國大陸

## 摘要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海外華人的線上交往程度也隨之加深，本文探討社交媒體如何形塑在日華人的交往形態，並從關係角度解釋跨文化適應中的影響機制。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多個社交平台中進行參與式觀察，選取了26位華人移居者進行訪談。對所搜集的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後，識別出23個初級主題、10個次級主題和4個核心主題。分析結果顯示，華人依據社交媒體塑造出彈性的技術邊界，並基於此在族群內外形成了圈層分離式的交往結構。族群內部

王雨菲，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專任教師。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跨文化傳播、輿情治理。電郵：210202043@njnu.edu.cn

張寧(通訊作者\*)，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媒介與流動人口、媒介技術與社會變革。電郵：42068@njnu.edu.cn

朱曉宇，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專任教師。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健康傳播、文化傳播。電郵：zxiaoyuk@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4年12月30日。論文接受日期：2026年2月9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以前輩關係為紐帶，建構出低流動性和高義務性的新型熟人社會，族群外部則採取陌生人式的人際關係，具備明顯的不穩定性特徵。這一交往格局也奠定了華人「跨文化配得」的適應路徑——在文化和權力的雙重影響下，一方面迴避衝突，主動適應東道國在符號、禮儀和道德等方面的規範，以此滿足日本社會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由於權力分配不均，華人不願觸及日本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也不追求深度融入當地社會，而是通過調整交往邊界，在兩套關係結構間反覆協商，以謀求足夠的生存資源。

關鍵詞：跨文化適應、數字社交網絡、主題分析、社交媒體、新移民

Special Issue Article

# Boundaries of Ethnicity and Compromise Strategies: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ocial Networks on the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Yufei WANG<sup>a</sup>, Ning ZHANG<sup>b\*</sup>, Xiaoyu ZHU<sup>a</sup>

<sup>a</sup>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an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Mainland China

<sup>b</sup>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Mainland China

---

##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online social eng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hape the interactional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and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interactions influence their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framed through a *guanxi*

---

Yufei WANG (Instructor).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an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Email: 210202043@njnu.edu.cn

Ning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mail: 42068@njnu.edu.cn

Xiaoyu ZHU (Instructor).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an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health communic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zxiaoyuk@gmail.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30 December 2024. Accepted on 9 February 2026.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6 (2026)*

perspective.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mbin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26 Chinese migrants. Systematic coding revealed 23 primary themes, 10 secondary themes, and four core themes. Findings show that migrants create flexible technological boundaries on social media, enabling a layered mode of interaction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ir ethnic group. Internally, connections are based on seniority ties, forming a low-mobility, high-obligation acquaintance network. Externally, interactions follow stranger-like logics marked by instability. This interactional structure underpins what we define as “Intercultural Qualified Belonging.” Influenced by cultural and power dynamics, migrants navigate dual pressures: they proactively adapt to Japanese social norm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eet cultural expectations, yet, due to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they refrain from fully engaging with Japan’s core value systems or pursuing deep integration. Instead, they strategically adjust social boundaries and negotiate between distinct relational structures to secure essential resources for survival.

**Keywords:**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digital social networks, thematic analysis, social media, new immigrants

## 引言

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傳播已經持續百年，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人口的跨國流動成為常態。根據日本2024年公佈的在日外國人數量統計，在日外國人共有3,588,956人，其中華人數量為925,038人，是在日外國人中的第一大群體。<sup>1</sup>人口群體性流動的背後伴隨著其所屬群體文化的流轉，大量的華人移民進入日本社會，既通過組建各類華人社團、華文媒體、華人學校等方式構建出華人在當地的社會組織；又採取參與各類在地國組織的策略，嘗試擺脫文化陌生人的身分。

既有的研究框架中，對於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分析，多數集中在以唐人街為代表的線下社區，描述其與日本社會的連接特徵。以橫濱、神戶和東京池袋等地的唐人街為例，當地的華人群體圍繞學校、住房和兼職崗位建立文化飛地，雖然這一社區形式已經成熟(Liu-Farrer, 2013)，但並未表現出明確的文化融入特徵。即使從1990年代開始，日本就提出了「共生文化」的概念，強調去政治化、去少數群體化、以及去歷史化的文化策略，以適應全球化發展，但是日本民族的單一性特徵仍然顯著，使得外來移民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連接十分脆弱，進而加劇了社會分散(栗本英世, 2016; Yamashita, 2021)。近年來這一交往形式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由於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線上平台拓展了華人移民的交往範圍，使得分散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可以直接在平台中產生聯繫，形成新的跨文化社區(Wang, 2020)。另一方面，由於新冠疫情期間日本採取的社交隔離和入境檢疫政策，華人的入籍交往也被迫從線下轉向線上，基於這一交往形態的變化，本文主要關注華人的數字交往。

當前對於華人線上社區的研究，主要關注傳播的內容層面，對社交媒體中的話語進行分析，但是相對缺乏對關係的關照。Knoke與Yang (2020)認為社會網絡中的關係結構相比於其他指標更加重要，可以從更深層次的行為影響，因此本文從人際關係的視角出發，關注在日華人依託社交平台建構起來的關係結構，以及線上交往與其他社會網絡之間的互動，並進一步挖掘社交關係與跨文化適應之間的深層關係，豐富跨文化適應的研究路徑和理論內涵，也為提高在日華人的社會適應提供幫助。

## 文獻綜述

### 跨文化適應的研究路徑

跨文化適應是指在個體在兩個不同文化的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致使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 (Redfield et al., 1936)。跨文化適應研究起源於人類學，後續在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領域展開，構建出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

早期研究者強調關注跨文化個體在心理方面的變化，例如，Berry (1992) 提出了著名的壓力－應對模型，並指出不同個體在異文化環境中會形成不同的適應模式，包括整合、分離、同化、邊緣化四種路徑，並借此平衡好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的關係。後期相關研究則更多延伸到了行為層面，傳播學開始介入到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以 Gudykunst (2003) 為代表的研究者，遵循文化習得的研究路徑，將跨文化適應的過程視為學習異樣文化技能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強調人際關係和資訊傳播在跨文化適應中的重要作用。相關理論認為，有效的跨文化傳播可以降低作為文化陌生人對東道國社會產生的不安和焦慮，進而促進跨文化適應。雖然跨文化旅居者面對新文化環境中的不適應會產生壓力，但是旅居者也會對環境變化作出相應的變化，以求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在這一語境下，跨文化適應表現為壓力－適應－成長的動態過程。Kim (2001, 2009) 則是進一步提出了跨文化整合理論，再次強調了傳播互動的重要性，認為適應過程包括文化學習 (acculturation) 和文化卸化 (deculturation) 兩個部分，大眾傳媒和人際傳播會在其中產生顯著影響，適應的核心則是移居者與東道國的交往能力 (host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雖然 Gudykunst (2003) 和 Kim (2009) 的理論模型在後續的研究被廣泛應用，但也被指出理論模型中未考慮到文化和權力關係的複雜性。文化本質上涉及到符號、價值觀、禮儀等各個方面，並且是由不同群體之間不同視角、利益和權力關係鬥爭的結果 (Weng, 2015)，因此文化適應過程和結果都需要在不同層次和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展開 (Ward & Geeraert, 2016)。有學者提出了用差異性適應理論 (differential

adaptation) 替代傳統的適應理論，強調不同移居者會因為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差異而造就不同的適應經歷，文化適應並非是移居者單向的接收過程 (De La Garza & Ono, 2015)。與此同時，Gudykunst (2003) 和 Kim (2009) 等人是基於傳統的傳播環境提出的理論模型，隨著社交媒體對於跨文化適應的介入，改變了原本大眾傳播和人際關係的形態，先前的理論模型對於社交媒體傳播生態的解釋力不足，因此研究開始轉而討論技術中介在其中產生的影響，試圖在交叉學科中尋找新的理論視角以適應這一變化。例如，有研究引入線上社區實踐理論 (online community of practice)，認為線上社區中成員的共同領域、共用實踐活動和成員關係建立是三個促進文化適應的核心要素 (Wong & Liu, 2024)；而由於文化傳播的多元性，則可以借助溝通適應理論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和期望違背理論 (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對 Kim 的模型進行補充，通過趨同和分歧兩方面出發，分析跨文化情境中的行為是否具備適應性 (Hoffman & Zhang, 2022)，這些理論都為跨文化適應研究領域提供了分析框架。

### 社交網絡與跨文化適應

社交網絡是指社會成員之間通過互動形成的關係體系，是人和人之間基本的連接形式 (Mitchell, 1974)。早在 1999 年 Smith 就提出了社交網絡與跨文化適應存在緊密的關係，社交網絡的屬性可以改善異文化之間的關係，同時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定 (Lee, 2014)。

首先，社交網絡會影響文化行為。當旅居者進入東道國社會時，原有的社交網絡規模、網絡同質性和網絡緊密度是影響文化適應程度的重要變數 (李小紅、封佳琦, 2021)。同時，東道國社會網絡的結構特徵也會影響旅居者的主觀交往意願和客觀融入水準 (郭小弦、宋京恩, 2021)。例如，一項針對巴賽隆納移居群體的研究發現，個人在強關係網絡的交往中，交往對象的民族多樣性有助於提高對異文化的認同 (Bobowik et al, 2022)。Hofhuis 等人 (2023) 通過對德國和荷蘭留學生的研究也間接證明了，維持母文化的取向往往與高密度、同質性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社交網絡結構相對應，這類網絡雖能提供情感支持，卻限制了與東道國文化的接觸，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適應過程。

其次，社交網絡本身的形成並非中立，往往深受個體所承載的文化框架塑造。既有的文化框架也會影響社交網絡的關係結構，從而參與塑造旅居者群體所在國和母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Khaw 等人(2023)通過對來自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202名移民的調查發現，語言、價值觀及傳統等文化因素深刻影響移民的社交選擇，促使他們形成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緊密社交圈層(同胞網絡)，從而增強了群體內部的「綁定資本」。這種基於文化認同的社交網絡不僅是移民獲取創業資源和資訊傳遞的重要管道，也促進了移民通過創業活動在母國與東道國之間構建緊密的社會經濟聯繫。正是這些文化因素，引導個體在社交網絡中偏好某類群體、互動形式和網絡結構，強化或限制了跨文化橋接的可能性。

在中國的文化框架下，社交網絡的結構具有明顯的特殊性。與普遍信任和連接資本不同，中國式社會網絡更強調「關係」，一種基於信任、情感和義務的私人連接體系。這源於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裏「以家為本」的秩序理念，家庭和諧被認為是社會秩序平穩運行的基礎(Jenco, 2017)，而「關係」則被視為是家庭的外化。這種對關係性和對集體主義的看重被進一步表現為對整體利益的認同。在該框架中，關係、面子與人情共同構成了華人社會網絡的核心機制，形成情感、義務與互惠為基礎的私人聯繫網絡(翟學偉, 2005)，這種通過信任關係轉移的關係網，能夠提供超越西方特定化信任和紐帶資本限制的更多社交機會(Feng & Patulny, 2020)。

在這一互動機制中，社交媒體平台已成為社會網絡構建的關鍵基礎(Xie & Chao, 2022)，不僅延續了文化認同群體的關係網絡，也為異文化之間的交流提供了結構性機會。通過社交媒體形成的線上社交網絡不僅能夠幫助旅居者緩解文化衝擊，還能幫助其形成「文化緩衝帶」，提高其對東道國文化的適應度(Ju et al., 2016)。Alencar (2018)通過對來自不同國家的18名難民在荷蘭的融入情況進行調查後發現，社交媒體是難民建立聯繫、橋接社會資本及維繫原有社交網絡的重要工具。而文化框架也會影響旅居者在社交媒體等現代交流工具上的選擇性參與

(Lai & Cai, 2023)。高曉瑜(2022)通過對旅華留學生的研究發現，借由社交媒體建起的留學生去中心化的、流動的、分佈式的社會網絡關係，有助於留學生彼此發展多元性關係，提升其對東道國的文化認同。

### 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現狀

雖然中日兩國之間的人口流轉和文化交往都具備深厚的歷史，同時在日華人的數量已經超過外國人總數的30%，但是針對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研究數量並不多，主要集中在不同子群在進入日本社會後，對於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在認知、態度和行為上產生的變化。

在日華人群體中包括了主婦、留學生、勞工、二代移民等不同子群，不同子群的跨文化適應呈現出差異化特徵。例如，具備永居身分的華人移民群體會採用「超越志向」的文化適應策略，不會單一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日本人，而是以第三身分進入東道國社會(趙師哲、田中共子，2020b)。而在其二代子女方面，由於繼一代白領父母後長期接受東道國主流教育，在對於母國社會的身分認同、語言學習等等方面會進一步與一代父母會產生一定差距(園田茂人，2022)。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社會的跨境產業，使得原本在被日本社會邊緣化和收入水準低下的華人主婦群體重新獲得了社會經濟地位，進一步降低了其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經濟和語言障礙(張潔，2022)。在留學生群體中，以「人情」為核心的中國式社會關係在東道國仍然得以延續，留學生群體中「酒桌文化」依舊是維繫自身社會交往，建立身分聯結的重要方式(毛新華、大坊郁夫，2006)，同時有研究指出由於中日文化的高度相似，被認為具有普遍的亞洲文化價值觀，包括集體主義、情感自製、家庭共用、和諧策略等等，這些相似性也都反應在兩國的跨文化適應行為中(Zhang, 2023)，致使日本作為東道國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差異，從而缺乏社會支持，影響了中國學生的文化適應(殷夢茜、青木紀久代，2017)。

從過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對於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分析，大多希望通過兩國社會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適應問題找到解決方案，以提高華人在異國社會環境中的融入程度。但是一方面，多數研究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文化看作一個抽象概念，沒有區分文化的不同層面。例如，未分析中國和日本在價值觀層面的差異性，以及如何影響華人在異文化環境中的社會交往和文化適應。其中包括，恥感文化在日本社會所形成的對於規則的嚴格遵守，強調個人服從規範，而中國與之相似的人情和面子文化，則注重的是由地位優越性和能力所驅動的社會互動，強調群體交往中的互利性特徵(翟學偉，2016；Wei & Li, 2013；Xiao & Zhou, 2024)；另一方面，未將跨文化適應看作一個整體，更多是作為變數進行分析，缺乏對於權力結構和社會不同維度的關注，同時較少談到社交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之間的關係。例如，在香港地區的移居者中，雖然社交媒體可以促進與當地的溝通，但是也放大了社會中的權力鬥爭，促使少數族裔的邊緣化(Lai & Cai, 2023)，那麼相比之下，日本社會的語境中，社交媒體的使用與交往模式、民族身分等方面是否存在關聯，以及是否具備區域特殊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傳播學視角，將跨文化適應視為個體進入異文化環境後，通過交往和傳播與當時社會產生關聯的動態過程，分析文化在本族群和東道國社會中的流動方式，以及與周圍環境和當地社會產生互動的過程。

基於此提出研究問題：

- (1) 在日華人的數字社交網絡具備怎樣的形態特徵？形成了甚麼樣的社交關係結構？
- (2) 社交關係如何作用於華人跨文化行為？形成了甚麼樣的跨文化適應路徑？

## 研究方法

### 數據收集

在數據收集階段，本研究選取了26位對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以獲得足夠的經驗材料。由於日本的在留資格類型較為複雜，本文將身分類別大致分為留學、就業、家族滯在和永住四種，以便對訪談對象

展開分析。三位研究者分別在不同的線上社區中進行了一個月左右的參與式觀察，途徑包括微信群組、豆瓣小組、小紅書社區、LINE、Facebook等不同管道，以避免在單一平台中獲取資訊的局限性。在招募的訪談對象中，在留身分包括留學生8人、就業13人、家族滞在3人和永住獲得者2人；性別構成是男性10人，女性16人；年齡區間為21歲到58歲。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訪談採用了線上文字和語音兩種形式，語音部分經過錄音後再採用飛書軟體轉化成為文字資料，字數總計274,560字。訪談提綱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交平台的使用情況，包括使用場景、使用習慣以及在日本和中國兩個不同區域中使用習慣產生的變化；第二部分是華人在東道國的社會交往情況，具體包括人際關係、交往方式和交往動機等；第三部分是對於日本文化的認知和態度，具體體現為融入意願、社會接納程度和文化差異感知。

## 主題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的方法，該方法繼Braun和Clarke (2006)提出後，於2019年在原有框架上進行拓展(Braun & Clarke, 2019)，增加了對於研究者反思性和動態性分析的要求，本文依舊按照經典的六階段分析，分別包括(1)熟悉數據；(2)生成初始代碼；(3)尋找主題；(4)審查主題；(5)定義主題；(6)撰寫報告，並結合反思性要求，在分析步驟中減少自身的偏見和假設。

在開始編碼前，研究者需通讀訪談資料，並將研究主題帶入其中。進入編碼階段後，首先需要對文字進行逐字逐句分析，並打上標籤，對相近的概念進行整合，獲得59個初始代碼。在尋找主題的階段，在各個初始代碼之間進行比較和歸納，並基於內在主題的一致性，識別出23個初級主題。進一步分析發現，初級主題之間同樣存在關聯性，例如，在數字交往中，是否有用會成為華人判斷是否維繫關係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基於初級主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對主題進行再次歸類，將23個初級主題進一步劃分為10個次級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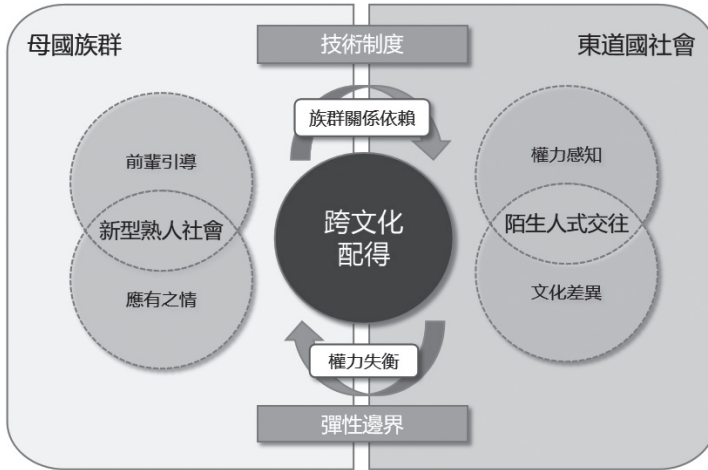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在完成初級主題的生成和次級主題的歸納後，研究需要提煉核心主題。基於前敘步驟的反思和分析，對於次級主題進行進一步的整合，挖掘內在的核心邏輯和結構關聯，最終得出四個核心主題，包括數字交往形態、數字社交網絡建構、新型熟人社會和跨文化配得。跨文化配得指的是受訪者在東道國社會的互動中，依據於關係結構所採取的交往匹配策略，其中匹配包括文化和權力雙重維度。移居者不再將文化融入作為目標，而是在族群外部，主動將自身行為調適到與東道國社會規範相匹配的狀態，以避免交往衝突可能造成的社會資源短缺，在權力受損時則會退回到族群網絡中尋求幫助。這四個核心主題也分別對應了研究主題的四個子問題（見表一）。

表一 主題編碼表

初級主題	次級主題	核心主題
工具性交往 情感性交往 趣緣性交往 規範性交往	交往方式	數字交往形態
血緣關係 伴侶關係 組織關係 一般性關係	社交關係構成	數字社交網絡建構
線上社區 線下參與	交往空間	
群內關鍵節點 熟人拉新	交往入口	
族群內部 族群外部	族群邊界建構	新型熟人社會
社會輿論 公共事務	東道國社會機制	
與日本人衝突 同胞矛盾	避免衝突行為	
決定是否融入	融入意願	
文化接近 文化差異	文化感知	跨文化配得
社會資源 話語權分享	權力感知	

圖一 主題分析模型



在依次獲得初始代碼、初始主題、次級主題和核心主題後，將研究問題再次帶入到核心主題當中，通過對於編碼結果的反覆整合修正，最終得出了在數字社交網絡對於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主題模型，如圖一所示，主題模型總結了影響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核心要素。

## 華人數字交往形態分析

### 交往的技術分配與制度化邊界

既有研究證實了社交媒體對於適應陌生文化具備重要的作用，會對旅居者的認知、態度以及行為模型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然而對於是否能夠促進文化適應並沒有定論。例如，社交媒體的介入雖然可以維持與母國和東道國的聯繫，但是也促使了跨文化群裏不同社交群體採取區隔化的溝通方式 (Lim & Pham, 2016)。根據編碼分析結果來看，不同平台的使用會促使數字交往邊界的產生，其中的驅動力包括技術性和工具性因素。

從獲得的訪談材料發現，在日華人分別採用了中日兩套社交媒體使用體系，在沿用中國社交媒體以維護同胞交往關係的同時，絕大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分受訪者也會通過順應日本社交媒體與當地社會建立聯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選擇並非簡單的隨機分配，而是在使用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地區偏向，並在兩套社媒體系中形成了明顯的邊界區隔。在對於中國社交媒體的沿用中，華人群體雖然身處日本社會，但是受訪者提及頻率最高的仍然是微信，微信既是聯繫國內親友最直接的管道，也是華人圈子的連接工具，幫助華人形成平台內的同族群聚合，其餘的平台使用則集中在小紅書和抖音；在順應日本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時，受訪者提及較多社交媒體的是LINE，作為日本地區具備代表性的社交媒體，LINE主要用於華人族群與當地所在組織或社群成員的聯繫，其他平台使用分佈較為分散，包括Teams、Facebook、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Slack等。有研究認為用戶在進行平台使用分配時具備高度的自主性，有著強烈的行為動機(李嫺嫺，2022)，那麼平台分配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自我的交往分配，用戶會將不同的社會關係放置在不同平台中(董晨宇等，2020)。從這個角度來看，微信作為在日華人主要的交往平台，實際上仍然承載了華人主要的交往關係，即使身處東道國社會，這一結構並未完成遷徙，而是仍然在族群內部展開。例如，受訪者提到「微信之類的跟中國華人有專門一個群，然後從裏面一個一個慢慢認識，認識多了後就慢慢建成了一些新的華人群。」(S2)與此同時，華人雖然對於中日兩套社交媒體會採取混合使用的策略，但是兩套體系之間存在明顯的邊界區隔。

有研究證實了語言資本、身分認知、自我認同等方面會對平台的使用分配產生影響(Lai et al., 2022)，會在不同平台之間形成文化邊界。Wimmer (2013)認為，制度也是維繫這種邊界(boundary)存在的重要要素之一，制度不僅包括已經建立起來的國族，同樣也包括文化、市場、宗教等。從這一視角來看，在日華人對於微信等中國社交媒體的延續使用在被視為一種文化慣習時，平台和交往分配實則也會受到社交媒體技術依託的制度影響，形成以技術為主導的分配模式。

其中，中國社交媒體的相對封閉生態，是網絡防火牆及其制度影響下的典型表徵。對於華人族群，尤其是初入東道國社會的旅居者而言，母國社會形成的媒介使用慣性往往會被延續。儘管他們在日本已不再受到網絡防火牆的直接約束，但其在母國的社交網絡仍受該限制

影響，因此他們仍需繼續留在原有的中國平台，以維繫與母國的關係結構。例如，有受訪者指出，「一般和國內的家裏人還有朋友甚麼的也只能用微信之類的了，其他的國外那些用不了。」(S19)同時，中國社交媒體的強制度特徵容易將非母國用戶排除在外，其中嚴格的實名認證、資訊可追溯、海外手機號限制等機制共同推動華人族群形成相對封閉的交往網絡。有受訪者提到「中國人還是微信聯絡比較方便，還可以收付款，不受限制。」(S16)相比之下，以LINE為代表的日本社交媒體，則是更傾向於弱制度化的技術工具。其不需要完全實名、內容本地化管理等特點，也更符合日本無緣式的社會關係。但對於中國用戶來說，則會降低其與東道國用戶產生深度聯繫的可能，同時會引發信任感不足的問題。例如，有受訪者表示「老是遇到隨便加我LINE的，然後就被我拉黑了，LINE很容易被殺豬盤。」(S23)

從縱向對比來看，無論是在中國社交媒體體系還是日本社交媒體體系中，受訪者都更加偏向通過微信和LINE這一類個人平台建構交往關係，通過小紅書、抖音、Instagram這一類公共性平台獲取資訊，對於獲取到的有用資訊會流入個人平台成為共用資源。例如，受訪者提到，「微信啥的反正天天用就是跟家裏人聯繫的，LINE會跟同學還有同事甚麼的聯繫，聊聊工作上的問題，小紅書推特啥的獲取些新資訊吧，搜點日本的資訊和熱點，然後也會拿來分享。」(S18)對於在公共性平台的使用中，除了同樣也會因為受到防火牆的影響、形成資訊流通的閉合外，由於中國社交媒體在支付、買賣、物流等功能層面對於日常生活的滲透程度更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一部分原本在東道國社會生存的必要技能，包括語言學習、主流價值觀等。因此，有受訪者表示「一般下班之後或者是節假日的時候，小紅書、抖音幾乎手機不離手的時候都會翻看，需要上面的資訊。」(S15)這些因素都使得華人用戶對於母國平台的黏度更高。

### 主觀支持感知下的交往驅動與社交網絡彈性邊界的形成

華人內部的數字群體之間同樣存在技術邊界的劃分，群組和群組之間的連接並不是無條件暢通，交往分配同樣遵循技術制度和自主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擇的原則，分析發現，產生族群內部交往差異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對於支持感知的主觀判斷。不同於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劃分方式，其邊界主要依賴技術制度的分配，並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個體主觀感知的顯著影響。這一分層機制不僅影響了族群內部的交往模式和文化認同，也保留了一定的邊界彈性。與傳統線下社區的封閉性相比，數字交往具備更高的流動可能。

首先，工具支持和技術制度的雙重作用，使在日華人的社交媒體使用分配呈現出明顯的二元結構，即中日兩套體系並存。在使用分配上，並非平均分佈，而是展現出分層式的使用模式，並形成了清晰的制度化邊界。以微信為代表的中國社交媒體更多作用於族群內部，用於和母國以及在日同胞的社會交往，而以LINE為代表的日本社交媒體則用於和東道國社會產生聯繫。這種媒介使用的分層性，具體反映了平台技術制度與文化結構在交往邊界構建中的深度介入。

已有研究指出，中國移民高度依賴核心關係 (*core guanxi*) 和非正式聯繫，傾向於通過親友和熟人獲取資源 (Feng & Patulny, 2023)。社交媒體的使用分配恰好體現了這一關係結構在社交網絡中的延展性需求。與社會資本不同，關係 (*guanxi*) 更加強調長期持續與義務式的互惠行為，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使用中，工具性支持被反覆強調，與此同時會將回報也作為拓展交往的環節，例如有受訪者提到「小紅書認識很多中國人剛來日本，日語不好需要翻譯，我都熱心免費幫助。」(S15) 這進一步佐證了在平台內的幫助與支持，實際上已成為華人維繫數字關係的重要動力來源之一。這種以功能性為導向的交往模式亦體現在華人族群的數字網絡中。不過，即便共用語言與文化資源，但族群中的交往行為更多取決於用戶對關係效用的主觀判斷，族群內部的交往差異也反映出用戶基於支持感知所進行的選擇性連結。已有研究證實了社交網絡為移民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支持 (Aguilera & Massey, 2003)。Ong 和 Ward (2005) 進一步將這種支持劃分情感支持、社交陪伴、有形支持和資訊支持等功能。Lu 與 Hampton (2017) 指出，這種支持實際獲得與否，往往取決於個體的感知與策略。因此，即使身處同一文化語境，華人用戶在數字交往中仍展現出選擇性與分層性，映現出族群內部邊界的動態彈性。

研究發現，移居者在進入到東道國社會後會消解母國原有的支持網絡，而社交媒體在這一過程中則會成為社交網絡的補充，為跨文化用戶繼續提供社會支持。一方面，華人對母國社交網絡的支持感知存在矛盾。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朋友圈不太好發，就當樹洞發一下記錄一下，挺好的。每次說日本的一些做得好的地方，就會被罵。」(S9)這反應出母國親友與旅居者之間的資訊理解錯位，導致認知隔閡，從而削弱了在日華人對於母國網絡的支持感知。面對這一情形則會採取主動構建交往邊界，不會主動提及和分享其在日的生活狀況，也不涉及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差異性，主動與母國親友之間保留一定的資訊真空。

另一方面，支持感知評估同樣會出現在華人族群內部。例如，有受訪者提到「在想要去擴展人脈，收集素材，有需要的時候就建立聯繫，尋求資訊時候就會想要去線上找人」(S16)；「和華人交流能知道一些在日本的生活經驗。比如租房子在每個區繳稅不一樣」(S6)；「文化背景接近有類似的生活經驗和體驗，懂現在的梗，有話好聊，相較之下能聊得來不太會無話可說，相處起來不累。」(S19)這表示，雖然華人用戶會主動去尋找同一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接觸和交往，表層看來是文化認同在發揮作用，但是事實上其目的更多只是為了更輕鬆地交流，亦或是可以進一步通過更加低的成本獲取社會資源。

因此，雖然既有研究證實社交媒體可強化既有社交關係，其分層使用亦可能加深族群內外的交往邊界，但這些邊界並非絕對固定，而是受個體感知與策略性選擇的共同影響，在不同使用情境中呈現出動態調整的可能。這也說明，雖然同一群體中文化趨同仍然是形成群體的重要驅動力，但是數字交往中的關係聯結形成也不會完全受制於原有的邊界，由於個人的自我感知會被放大，華人用戶的行為方式也會傾向於感知認同下的簡單適配。這一變化最明顯的表徵在於，華人用戶在主動去尋找同族用戶、判斷是否建立關係時存在明顯的隨機性和主觀性，與傳統的民族歸屬、政治經濟系統支配所建構出的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妥協相比(Wimmer & Schiller, 2002)，共同體思想在平台中表現得並不顯著，而是由個體經驗主導下的關係延展，進一步依賴工具式互惠所凝結起來的淺層共識，這樣的主導方式使得共識的含義變得更加模糊，群體邊界也因此具備更高的流動與變化可能。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此外，族群邊界也並非恆定不變，而具備流動與跨越的可能。相較於線下華人聚居區所形成的種族邊界，以技術驅動的社交平台體系則展現出更低的封閉性。這種特徵來自兩方面：其一，平台的物理門檻較低，透過簡化操作以提升用戶活躍度，促使用戶具備高度的主動性，能在不同群組與社群間自由切換。例如，有受訪者提到「不同的群反正我都加點，最多的肯定還是學習打工的這種群，但其他的也會加，反正多加點也可以多接觸點，平時都看看也沒甚麼壞處，誰知道呢說不定以後有用呢。」(S24)其二，族群內的資源流動減弱了社會資源的固化。有受訪者表示「平時如果找不到兼職或者打工的時候，就去加小紅書微信之類的群，有那種專門招工的群，裏面就會發招聘資訊出來，具體要求也看得到，線下找不到或者有的地方不要華人的時候，這種群裏也總能蹲到崗位的，我們自己店招人的時候也會在裏面發。」(S22)既有研究認為，社會資源與階層差異越大，群體間封閉性越強(Cornell & Hartmann, 2006)，而高封閉群體常透過象徵性邊界強化文化分化(Bourdieu, 1998)。但在社交媒體環境中，交往的可跨越性促進了資源的流動與再分配，從而降低了因資源不均而產生的群體封閉性。

從整體來看，以社交媒體為土壤建構起來的社交網絡邊界，具備明顯的彈性色彩。首先是邊界並非完全封閉的，華人族群內外存在可以協商和流動的空間；其次是邊界彈性的鬆緊程度取決於一對張力，兩端分別是技術所驅動的制度化和關係主導下的工具性支持，當技術和工具其中的某一因素收緊的時候，族群的邊界則會再次收緊。例如，華人在短期回國期間社交媒體使用會受到防火牆的限制；同樣，華人用戶會通過主觀認知判斷社交媒體上溝通的交往對象是否有用，在能夠滿足其工具性需求的前提下，社會關係則會獲得進一步的強化。這種張力的存在使得社交邊界得以不斷調整，既為華人族群提供了互動協商的空間，也使得其在面對不同情境時可以靈活調整交往策略。

## 華人數字社交網絡建構

### 數字交往的兩種形式：緊密關係與鬆圈主義

過往多數的移民研究認為亞洲的跨文化群體有普遍的文化相似性。例如，亞洲文化普遍存在嗜同性特徵 (Wimmer, 2013)，在文化適應中更容易依從原有傳統的亞洲價值觀 (Kim et al., 2001)，也更傾向於和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建立關係，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移居者的文化適應具備一般性特徵 (Xie & Chao, 2022)。有學者將這種具備相似文化屬性、且存在一定差異的文化形態定義為「sibling culture」，並指出即使具備文化共性，旅居者仍然需要應對巨大的適應挑戰，研究也證實了其中教育、社會融入等因素對跨文化適應造成的影響 (Zeng & David, 2007)。分析發現，在中國和日本看似相似的儒家文化框架中，華人旅居者同樣會面臨文化差異，並會將其映射在社交網絡中。

當前在中日兩個族群之間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交融狀態，而是分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模式，分別是日本人關係網絡對應的陌生人式交往和中國人關係網絡對應的緊密式交往。華人族群內部的交往更加密集，這種密集與中國的關係文化具備顯著關聯，關係是獲得社會資源的重要條件，離開母國社會後，原有的社會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被切斷了，迫使華人轉而建立新的關係網絡，以延續社會資源的獲取，社交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儘管平台追隨並放大了個體的交往主動性，但是最終形成的社交網絡並非完全以趣緣為關係紐帶、個體節點佔主導的現代化結構。相反，與傳統的關係文化如出一轍，華人族群內部仍然保留了明顯的地緣、業緣和血緣等熟人特徵，傳統熟人社會中的情感、禮儀和利益 (費孝通, 2020) 等因素對於在日華人圈的關係中同樣具備解釋力，同族群關係網之間義務性的互惠互利會成為華人圈子中的默許規則。例如，受訪者提到的「華人之間就互相幫助，經常走動，經常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問題」(S10)；以及強調「微信上只要有人問我，只要我有空都會回答。」(S15)

與之相對應的是華人的日本人關係網絡。華人與日本人的交往更貼近陌生人社會的交往方式，存在更強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特徵。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訪者中對於日本人最多的交往來源分別是學習和工作，而社交媒體則通常是用來維繫這一關係的工具。有受訪者提出「來往的話還是有幾個華人朋友可信的，相比之下日本人距離感比較重，之後考慮認識幾個日本同事，一般也都是工作才能遇得到日本人，日本社會都是各幹各的，互不干擾才是最好的。」(S17)這一現象與日本的個人主義轉變相契合 (Fischer et al., 2012)。同時，一方面由於日本特有的恥感文化，在社交中對於個人和規則的強調與中國關係的共用性特徵存在一定衝突 (Benedict, 1946)；另一方面，日本社會結構中普遍存在的團體主義，通過潛在性規則和情緒性表達塑造出內外有別的集體意識，外來族群往往被排除在外，這也是日本單一文化的根源 (工藤剛治, 2018)，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雙方的深層互動。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關係網絡和日本人關係網絡之間的交叉並不顯著，甚至在中日伴侶的關係中也很少會形成頻繁的跨族群往來。換言之，華人對於兩國人的交往更多仍然是在華人圈內完成，這一交往結構進一步促成了資訊的不對稱，並使跨文化理解受阻，部分受訪者因此也提到了「日本社會對華人的認知存在偏差與隔閡。」(S20)

### 維繫交往的重要因素：關鍵前輩和互助機制

研究普遍認為，旅居者會通過社交媒體建立聯繫，並在過程中獲取身分認同、情感聯結和社會支持。然而，多數分析都是將平台視為技術中介 (Kim & McKay-Semmler, 2013; Ngai et al., 2020)，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因素在其中產生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在華人數字族群內部的社交中，「前輩」角色和互助機制作為維持交往的重要因素，會在華人關係網絡中起到引導和支持作用。

在中日跨文化交往語境中所稱的「前輩」，是指較早進入日本社會的華人。「前輩」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進入日本社會的時間更長，二是具備更多可以分享的東道國社會資源，其中包括資訊、就業、生活等等不同方面。例如，受訪者提到，「我之前剛來的時候是之前學校的學長幫我弄的一些東西，房子保險甚麼的，還是挺感激的。」(S21)

以及「像我們勞務派遣就是去的時候他的證是三年，所以我們當時去人家公司會社住的地方的時候，他之前的前輩也在，就是也是中國人，就是其實之前在那邊上班的人。所以當時我們剛去上班的時候，他也會教我們跟我們說一些注意事項甚麼的，剛開始去上班的時候，也是由之前的前輩帶著我們一起去工作。」(S5) 這種前後輩文化在日本社會中也作為不同團體組織內部的劃分方式普遍存在，其劃分標準包括年齡、職級和資歷等等。前後輩之間也有明確的職責劃分，前輩承擔了教導和關懷後輩的責任，而後輩則需要分擔前輩的工作，為日後自己成為前輩積累經驗。這樣的前後輩文化在日本的各類社會組織中根深蒂固，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前輩引導制度」。事實上前後輩文化並不是日本社會所獨有，其文化來源於儒家文化中的「五倫」關係。五倫即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和朋友(孫通海，2011)，五種人倫關係構成了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基礎，在日華人的社交網絡中同樣會遵循前後輩的文化規範。由於同為華人，具備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經歷，在嵌入日本社會的過程中，較早期進入日本社會的華人會成為後來者開始建立關係網絡的關鍵節點。同樣，與日本的前輩相類似，由於早期進入日本社會的華人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的了解程度更深，華人前輩會為後輩提供一定的社會支持，包括在生活經驗、社會資源、價值觀和文化規範等等多個方面，以減少華人後輩在進入日本社會後的異文化衝擊。

在進入東道國社會之後，對於社交有用性的需求會一直延續，最終形成比較完整的互助機制，用於維持和拓展現有的關係網絡，是否能解決問題會成為是否繼續進行互動交往的重要標準。但與此同時，有用性並非僅僅表現為單向索取，而是會在獲取資源的基礎上進行回饋，最終形成雙向的互助機制。在日華人的互助行為與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強調的人倫關係有著密切聯繫，一方面是人情式人格的延續，雖然現代化特徵沖淡了中國文化中的地緣和宗族觀念，也改變了原有的鄉土交往形態，但是社會成員仍然延續了人情式人格(翟學偉，2005)，人情關係仍然作用於社會互動和公共生活中，在平台和人際交往中的人情特徵表現在，將為「我們」、「自己人」、「同胞」提供幫助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為普遍默認的交往規則。另一方面強調人際交往和社會關係中的應有之情，所謂應有之情是指在交往中需注重人倫中的義務，不同於現代社會中的概念，傳統人倫中的義務注重的並不是契約型關係，其本質為以身分角色為核心的託付關係。正如，有受訪者提到「說到底咱是自己人啊，華人在外面很多時候最後還是得靠自己和身邊人，日本人家自己都管不過來，雖然華人裏面也有騙子但是遇到事的話也只能找周圍人，一般別人有事我也會幫忙的。」(S23)在日華人的社交網絡中，以託付關係為基礎的交往形成了一種「資源共用」的文化妥協，追求利己和利他共存的關係結構，並且在此基礎上將中國人和日本人區分「我們」和「他們」，形成適應不同社交場景和社會關係中基於「應有之情」的交往規則。

### 新型熟人社會在異文化環境中的再現

在日華人族群內部對於人情式交往和託付關係的延續，都與熟人社會的特徵不謀而合。費孝通(2020)提出，中國的基層社會是一種由私人關係網絡拓展成的社會關係網，本質上是一種沒有陌生人的小圈子。這種基於私人關係向外層層拓展式的交往結構，為理解在日華人的交往與文化適應模式提供了理論框架。研究發現，在日華人依據平台搭建出的數字社交網絡，進而促成了一種新型熟人社會的結構樣態，不僅繼承了傳統熟人社會的關係紐帶，同時在東道國社會形成了文化適應的協商空間。

華人之所以在異國他鄉仍能維持相對封閉但功能完整的交往結構，與其在數字空間中所構建的信息閉環密不可分。受訪者表示「我平常用小紅書就很夠啊，哪裏有好吃的店哪裏有畫展小紅書上都有人會發，有的時候還有人低價出票」(S19)；「我們有一個專業同學群，一般有甚麼問題大家都會在裏面問。」(S1)微信、小紅書等中文社交平台與資訊平台已構成一個數字華人社會，即使無需依賴日本的社交媒體媒體，在日華人也能獲取滿足其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類資訊和租房就業等社交資源。這種以母語平台為載體的數字社交網絡，強化了群體內部的資訊迴圈 (Leurs & Ponzanesi, 2024)，使得個體即便物理上嵌入東道國

社會，其日常認知與交往實踐仍然可以植根於母國語境中。正因如此，許多在日華人即使長期居住在日本，也並不急於學習或適應日本主流文化，正如受訪者所言「沒有那種就是抱著要跟日本人特地去接觸的狀態去接觸，因為我們周圍也都是華人圈。」(S5) 這表明數字平台不僅延續了傳統熟人網絡的情感紐帶，也構建起一種數字化的熟人社會結構，使得文化適應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被緩衝 (Alsaleh, 2024)。

可以看出，雖然在日華人在地理範圍上遠離中國，並不具備相似的社會結構，在形成社會關係的過程中也缺乏所謂血緣和地緣因素。但是，在社交平台的交往中仍然存在與熟人社會相似的關係特徵，其中包括低流動性、禮俗秩序以及前輩主導的權力結構等。

### 文化邊界與制度張力：在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中間地帶

傳統的跨文化適應理論認為，跨文化者在離開母國、進入東道國社會後，須經歷原生文化與文化適應的歷程 (Kim, 2005)。在此過程中，社交媒體被視為影響文化適應的重要變數。對於多數華人而言，離開母國之後，社交媒體是其維持原有關係網絡的主要途徑，文化雖然可以提供認知與行為的隱性依據，卻難以轉化為強烈的共同體意識。而這一社會關係鏈條，致使文化邊界被技術媒介再次介入，導致旅居者即使能接觸東道國資訊，東道國的文化價值觀也難以深入滲透，最終導致一種處於兩者之間的「定居」狀態。例如，一位受訪者表示「我認識好多中國人，他們來日本十多年一直都在中國人的圈子裏打轉，一句完整的日語都不會說，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日本這麼久。」(S7) 文化學習與實際行為之間的斷裂，可以被視為社交媒體關係網絡中形成資訊的自我迴圈的結果。

社會結構的隔離並不僅存在於文化層面，同樣也體現在制度與角色期待的斷裂上。在日華人是否真正進入以契約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模式，實際上取決於其是否被東道國社會制度所收編。日本作為福利國家，制度設計基於社會契約以維持內部和諧穩定，但該契約並未完整涵蓋外來移民 (Wimmer, 1997)。例如，有受訪者談到「日本整體來說還是比較排外的，就拿日本人誇你來說，說你好的是說『你看起來很像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本人』，他會把好的東西往自己身上攬，就像如果是日企的話像外國人想晉升也是很難的，很多人只能去華人公司，一般簽證很多福利你也別想有，除非能拿到永住」(S21)；「我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有派遣公司把我們招來的他們幫我們辦了手續，我們就過來了，具體的一些政策甚麼的我們也不清楚，總之跟當地接觸的不算多。」(S5)從中可以看出，華人移居者雖受法律保護，但福利制度的涵蓋卻存在顯著差異，僅特定在留資格者如經營管理、高度人才或入籍者可享受醫療、就業、保險等制度性保障，其他在留類別則常被排除在外。同時，華人自身對於這一制度契約的理解與認同程度也相當有限。由於語言障礙與教育背景，大多數人難以快速掌握東道國制度所賦予的社會角色與行為規範，造成其內在感知與外部制度脫節。

這種制度性缺口使得許多華人在無法或不願承擔東道國制度角色的情況下，只能依賴地方倫理與人情義理來維繫社會關係。社會角色的維繫不再取決於制度履行，而是根據人際互動中的情感互惠與道德責任決定，當某個成員違反了這一預期，則會在群體中被邊緣化。由此所構築的數字社群結構，是一種制度角色缺席下的功能性替代，既鞏固了母國文化的邊界，也固化了其在東道國的邊緣位置。

### 跨文化配得：權力與文化的雙重影響

基於經驗材料和分析發現，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日本華人並沒有完全遵循傳統的文化適應的路徑，而是通過「跨文化配得」的方式建立與東道國社會的聯繫。「配」指的是夠得上、相稱之意，「配得」強調與他人或物品相符合或相適應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可以被引申為，在日華人在東道國社會中，尋找自身文化契合可能性的過程。這種尋找並不把追求深度融入當地社會作為核心目標，而是通過僅與社會規範相契合，獲取與之相關的社會資源。同時，這種「跨文化配得」的方式也強調需要在交往中避免衝突，維護人際關係中的和諧與平衡，通過調整自身行為滿足東道國文化特徵的期待。「跨文化配得」中對「配得」的衡量主要包括文化和

權力兩個主要方面，其中，權力層面的橫量是以對社會的公平性感知作為依據，而文化層面的匹配則是區域文化脈絡中同源部分的驅動結果。

站在傳播學和人際關係的視角研究跨文化適應中的權力關係，需要回溯到前人研究的路徑當中進行比較。早期對於跨文化適應的分析是基於文化學習路徑展開，文化適應和原生文化往往被當作一組相對的概念，原生文化指的是移居者在母國社會中形成的第一文化 (Spiro, 1955)，文化適應則是移居者對於與異文化的接受過程。從原生文化到文化適應的過渡，可以通過培訓和學習來實現。在這一時期提出的焦慮不確定性理論、跨文化適應整合理論都是基於這一邏輯，研究強調為了學習東道國文化，陌生人必須進行有效的傳播互動 (Kim, 2001)。後續研究認為 Kim (2005, 2009) 未考慮到文化的複雜性和社會權力因素，因此，可以通過差異性適應理論修正原有模型的局限性，強調文化適應不應當被簡單視為文化同化的過程，而是移居群體基於不同經歷作出的自主選擇。其中，權力是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核心，權力分配的不均會損傷移居者的權益 (De La Garza & Ono, 2015)。

權力問題在日本的華人群體中也有所體現，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原有的市場分工，使得華人在日本的經濟活動大多屬於低技術型勞動的類型範疇。在華人的各類求職社群中，雖然部分具備語言、專業以及教育優勢的留學生會進入技術型崗位的競爭當中，但是針對大部分的華人的工作招募仍然以計件制工人、兼職和數字勞工為主。換句話說，大部分華人在進入日本社會後，由於兩國在教育 and 經濟方面存在不對等，導致的結果是只有部分勞動市場向其開放，華人只能轉而被迫選擇低於東道國主流回報水準的工作。正如有受訪者提到的「誰說日本好找工作的，日本人是挺好找的，但是很多地方都會卡外國人，就算是留學生0內定<sup>2</sup>的也很多，不要說其他直接過來找工作的人了，大部分只能打零工，要不然就只能派遣。」(S14) 即使多位日本學者在過往研究中多次提到了外來族群存在就業困難、低技能勞動、非正式崗位等結構性問題，並認為語言能力是關鍵的調節因素，並就此提出了相應的改善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在大學開設商業日語、企業文化教育、企業實習等課程，以減少外來族群的就業焦慮 (稻井富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代，2012；井上惠，2016；守屋貴司，2018），但是並未從社會制度層面真正緩解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一現象的長期延續，使得華人對社會的公平性感知處於失衡狀態，促使華人向其他空間進行轉移，以謀求更多的生存資源。不同於傳統的唐人街的地域性聚集，社交媒體的普及使這種轉移更多向線上空間的集中。在華人的數字社交網絡中，成員之間的互助機制不僅延續了族群內部的關係結構，也因同時與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形成資訊斷層，而復現出類似熟人社會的數字飛地，為同族成員提供社會資源，並藉此與東道國社會進行權力協商。但是，由於以社交媒體為土壤形成的族群邊界相比於線下空間更具備彈性，數字飛地中不會出現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也難以形成深層次的文化認同。

與此同時，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華人族群內部的權力問題，這也是前敘研究中較少被關注到的部分。作為中國人際互動中的重要維度，權力在中國語境下特殊性在於具備可分享性的特徵。在傳統的鄉土社會，權力體現在以家族為核心的關係運作中，個體通過積累道德資本來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而面子，則作為權力獲得的外在表徵（吳飛，2009），可以通過交換人情式的互惠行為進行共用。在日華人的族群內，權力通過較早進入日本社會的前輩向熟人進行分享，與前輩交往密集的成員在族群內部也會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例如，在參與式觀察的過程中發現，被賦予族群內權力的後輩能夠參與管理新建立的社群，有權對後續進入社群的成員行為進行管理，在成員違反規範時也有權進行驅逐。

綜上所述，族群外部的失權促使華人轉向族群內部尋求支持，使得華人在資源獲取上更加依賴族群內部關係，從而加強了華人群體對族群內社會網絡的依賴。這一依賴也進一步促使其將本應對日本社會權力制度的接受，轉變為對族群內部權力結構的認同。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在文化層面存在一定的同源性，這種同源性的存在，提供了在日華人族群對日本社會淺層嵌入的基礎，使得雙方能夠在有限的範圍內實現接近與適應。

在後續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對於文化的複雜性以及社交媒體與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展開研究。例如，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交媒體在

雙文化身分中所產生的不同效用，再次討論了社交媒體在文化適應中同時具備的積極和負面效應 (Lai, 2024)，但對於文化地域性差異的分析並不多。以在日華人為例，華人的跨文化行為中，除了會保留族群內部的儒家文化底色外，同樣需要遵循日本的文化規範，需要根據對方特徵調整自身的行為來適對方 (Hoffman & Zhang, 2022)。因此，不同區域文化特徵的差異性可能會造成截然不同的文化適應路徑。在日本和中國的互動語境中，雙方同時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使得雙方在對於「和」的追求方面表現出了較高的相似性。在面對衝突時，雙方都傾向於採取非對抗式的方式來解決。例如，有受訪者認為「可以談論外國人和我們不一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因為外國人的思想和行為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會認同」(S6)；「目前不想玩 LINE、推特之類，不想接觸這些。」(S17) 在文化差異方面，日本文化更關注是否能夠按照社會預期進行儀式性的遵從，是一種更加正式的遵守道德規範的行為 (Collcutt, 1993)，華人則會採取與之相似的行為方式，以確保自身在與日本人的互動中的行為合理性。

具體到行為層面，日本華人一方面通過數字社交了解當地社會，並且調整自身行為，選取符合「禮」與「和」的柔性方式與日本社會建立聯繫，在這個層面中對於符號、法律道德、社會規範等等通常也會採取相對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契合日本社會的行為和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對東道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主動保持距離，通過非衝突的方式保留文化身分，以維護族群的內外文化平衡。例如，多位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到「沒必要融入。喜歡日本社會的距離感，工作時間正常交流就好，我不覺得要融入，但要理解日本，求同存異」(S14)；「不會強制自己融入日本人的圈子自得其樂」(S15)；「沒有想過要有多融入日本社會，普通學習能畢得了業就行，正常上班下班能拿得了工資就好，也不會分享自己的背景或者是中國的事情，這類東西都不太說，不喜歡引起別人注目，而且也怕引起別人的爭論。」(S19) 而在權力層面，權力的分配不均驅使在日華人選擇與主流日本社會保持距離的重要原因，配得體現在華人能夠靈活地從中日兩個關係網絡中獲取社會資源，當東道國社會中的權益受損時則會退回到華人社交網絡中，試圖通過人情獲取族群內部社會支持，並鞏固和拓展族群內部的關係結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在傳統的跨文化適應分析中，強調移居者所採取的文化調整策略。雖然過往的研究中也談到了權力因素和社交媒體對於文化適應的影響，但是較少考察基於關係結構與跨文化行為決策之間所產生的聯繫。從這一角度看來，「跨文化配得」可以被視為跨文化適應理論的延伸。在獲得的經驗材料可以看出，華人數字族群內外所形成的兩條關係網，會伴隨著是否獲取社會資源這一標準而產生滑動。華人族群則是通過調整邊界來間接決定自身的跨文化行為，強調權力資源分配和原生文化的雙重框架下，對於交往結構形態的動態調整，進而形成其跨文化行為的決策。

## 結語

本文將分析聚焦在在日華人的社交媒體使用，試圖分析一個根本問題，即在數字技術深度嵌入日常交往的當下，華人族群如何在技術、文化、權力的複雜結構中，尋求跨文化適應的新路徑。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對於旅居者來說不僅是作為通訊中介，而是承載了制度約束、文化慣習和權力資源的平台。其中，技術制度是形成華人族群關係結構的基礎，既有研究證實了社交媒體作為技術中介會直接影響用戶的跨文化適應行為，但是忽略了防火牆、強制實名等技術制度所產生的潛在效應。技術制度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中形成了邊界效應，並進一步促使華人用戶在族群內外的交往中產生了圈層分離，在族群內部依賴熟人提供生存資源，這種由關係文化主導的交往方式與平台之間的邊界相互疊加，進而在異文化環境中形成了新型熟人社會的樣態。相比之下，族群外部則遵循契約式的陌生人式關係，這一內外有別の交往形態為華人的文化適應過程提供了協商空間。

進一步來看，既有的交往形態促使華人族群選擇了「跨文化配得」的適應路徑。這一路徑補充了經典跨文化適應理論中關於普遍適應的預設，即旅居者能夠通過傳播實現預期中的文化過渡；本文在差異性適應理論所主張的雙向選擇概念基礎上，更加關注以技術為框架所形成的數字關係紐帶，如何嵌入在文化和權力當中，進而促成跨文化族

群的協商和博弈，並將跨文化族群的行為選擇作為不同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華人族群受到文化和權力的雙重影響，母國和東道國濃厚的儒家文化底色，對於和諧和集體的共同追求，促使雙方採用迴避衝突的行為方式，在符號、禮儀等表層文化中選擇主動適應，但是在核心價值觀層面則保持距離。與既有研究中對於在日朝鮮人和華人群體的考察結果相類似，研究者認為，移居者採取了「超越志向」式的文化策略，拒絕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二元文化，選擇採取中位數的整合模式(李正姬、田中共子，2010；趙師哲、田中共子，2020a)。本文對於華人族群的數字交往進一步後分析發現，華人族群的跨文化策略，實質上是在外部權力受限下的權衡選擇，企圖借助數字平台把迴避衝突的儒家文化腳本嵌入到關係結構和權力感知當中，一旦意識到自己並未被當地的社會制度所接納，則會立即收縮邊界，把資源獲取轉向族群內部的熟人關係。在這一行為過程中，儒家文化不僅是作為傳統的國族符號，而是一種伸縮自如的匹配方式，對外遵循東道國社會規則用於爭取合法席位，對內則通過情理和資歷進行關係排序。值得關注的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數字族群內部同樣具備權力的分配，並且伴隨人情往來而產生流動，這一點與東道國契約式的權力結構也存在差異，往後研究對於數字文化飛地的考察或許可以向內延伸。

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為華人的跨文化適應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是社交媒體的使用能否提高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能力，仍然需要回到中國文化的語境中進行考察，比如家庭、和諧、集體等文化要素，可以為華人的跨文化適應提供新的解釋視角；二是中國社交媒體體系較為獨立，更易強化同族群閉環，可能會影響海外華人的適應意願。同時，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選取了在日本的華人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簽證類型的劃分，試圖全面涵蓋日本簽證種類上佔主導地位的華人類型。但是，僅通過簽證分類並不能全面概括所有的華人群體類型，一些相對數量較少、邊緣化或背景複雜的群體未能被納入研究範疇；另外，在對權力的討論中，未涉及到政治分歧對跨文化行為的影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 註釋

- 1 e-Stat (2024年12月13日)。〈在留外國人統計〉。上網日期：2024年12月13日，取自<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4019020>。
- 2 「內定」為日文漢字，在中文裏為「錄用」的意思，這裏指的是指企業內部決定錄用某位求職者，並向其發出正式的通知過程。

## 披露聲明

本文研究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項目研究經費資助。

##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 ORCID

王雨菲 (Yufei WANG) <https://orcid.org/0009-0009-9145-6268>

張寧 (Ning ZHANG) <https://orcid.org/0009-0002-6937-824X>

朱曉宇 (Xiaoyu ZHU) <https://orcid.org/0009-0005-1851-5437>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16)。《現代漢語詞典 (第7版)》。  
商務印書館。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7<sup>th</sup> ed.). The Commercial Press.
- 吳飛 (2009)。《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Wu, F. (2009). *The meaning of floating life: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uicide i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李小紅、封佳琦 (2021)。〈在華印尼留學生的社會支持網絡與跨文化適應質性研究〉。《文化與傳播》，第4期，頁73–77。
- Li, X., & Feng, J. (2021). A qualitative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Indone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4, 73–77.
- 李媛媛 (2022)。〈數字遊牧民：複媒體環境中的社交媒體平台搖擺研究〉。《當代青年研究》，第3期，頁27–34、98。
- Li, A. (2022). Digital nomads: A stud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switching in a polymedia environment.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3, 27–34, 98.
- 孫通海 (2011)。《中華經典精粹解讀：孟子》。中華書局。
- Sun, T. (2011).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ssence: Menciu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高曉瑜 (2022)。〈連接在他鄉：在華留學生的社會網絡結構與東道國文化認同〉。《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第30期，頁119–123。
- Gao, X. (2022). Connecting in a foreign l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host country cultural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0, 119–123.
- 郭小弦、宋京恩 (202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華留學生的主客觀社會融入：基於西安樣本的分析〉。《青少年研究與實踐》，第3期，頁12–22。
- Guo, X., & Song, J. (2021).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Xi'an samples. *You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12–22.
- 張潔 (2022)。〈在日華人女性的文化適應與國際經濟活動〉。張禹東、莊國士、游國龍 (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 (第十輯)》 (頁181–19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ang, J. (2022).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among Chinese newcomer females in Japan. In Y. D. Zhang, G. T. Zhuang, & G. L. You (Eds.),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Vol. 10) (pp. 181–196).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費孝通(2020)。《鄉土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

Fei, X. (2020). *Rural China*.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董晨宇、丁依然、段采蕙(2020)。〈作為複媒體環境的社交媒體：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平台分配與文化適應〉。《國際新聞界》，第7期，頁74–95。

Dong, C., Ding, Y., & Duan, C. (2020). Social media as polymedia environment: Platform allo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7, 74–95.

園田茂人(2022)。〈夾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在日華人移民第二代對「中國崛起」的評價及其特徵〉(嚴立君譯)。《日本學研究》，第1期，頁3–22。

Sonoda, S. (2022).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caugh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ir evaluations of “China’s ris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L. Yan, Trans.). *Japanese Studies*, 1, 3–22.

翟學偉(2005)。《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北京大學出版社。

Zhai, X. (2005). *Human favor, fa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we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翟學偉(2016)。〈恥感與面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1–25、242。

Zhai, X. (2016). Shame and face: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Sociological Research*, 1, 1–25, 242.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Aguilera, M. B., & Massey, D. S.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ages of Mexican migrants: New hypotheses and tests. *Social Forces*, 82(2), 671–701.

Alencar, A. (2018). Refugee integration and social media: A local and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11), 1588–1603.

Alsaleh, A. (2024).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n culture and society. *Scientific Reports*, 14, 32140.

Berry, J. W. (1992).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a new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0, 69–85.

Benedict, R.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Bobowik, M., Benet-Martínez, V., & Repke, L. (2022). Ethnocultural diversity of immigrants’ 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global iden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4), 491–500.

Bourdieu, P. (1998).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aun, V., &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2), 77–101.

- Braun, V., & Clarke, V. (2019). Reflecting on 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11(4), 589–597.
- Collcutt, M. (1993). The legac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In G.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p. 111–15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rnell, S. E., & Hartmann, D. (2006).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2<sup>nd</sup> ed.). Pine Forge Press.
- De La Garza, A. T., & Ono, K. A. (2015). Rethorizing adaptation: Differential adaptation and 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8(4), 269–289.
- Feng, Z., & Patulny, R. (2020). Should I use my “weak” social capital or “strong” *guanxi*? Reviewing and critiquing two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Chinese migration. *Journal of Sociology*, 57(2), 464–482.
- Feng, Z., & Patulny, R. (2023). From *guanxi* to social capital and back agai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Australian Chinese migrant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44(2), 196–215.
- Fischer, R. (2012). Locating Chinese work behavior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X. Huang & M. H. Bond (Eds.), *Handbook of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tegrat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48–62). Edward Elgar.
- Gudykunst, W. B. (2003).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 Hoffman, W. B., & Zhang, Y. B. (2022). Explaining communication adjustment: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and its util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Interactions Research*, 2(1), 75–100.
- Hofhuis, J., van Egmond, M. C., Lutz, F. E., von Reventlow, K., & Rohmann, A. (2023).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ulturation,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8, 1186527.
- Jenco, L. (2017). Confucianism and its contexts: New research in Confucian political learn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6(4), 385–391.
- Ju, R., Jia, M., & Shoham, M. (2016). Online social connection: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se of new media in their adaptation process. *China Media Research*, 12(2), 76–90.
- Khaw, K. W., Thurasamy, R., Al-Abrrow, H., Alnoor, A., Tiberius, V., Abdullah, H. O., & Abbas, S. (2023). Influence of generational status on immigra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o start new ventures: A framework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15(3), 589–634.
- Kim, B. S., Yang, P. H., Atkinson, D. R., Wolfe, M. M., & Hong, S. (2001). Cultural valu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Asia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7(4), 343–361.

- Kim, Y. 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Sage.
- Kim, Y. Y. (2005). Adapting to a new culture: An 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W. Gudykunst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375–400). Sage.
- Kim, Y. Y. (2009).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In S. W. Littlejohn & K. A. Foss (Eds.),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243–247). Sage.
- Kim, Y. Y., & McKay-Semmler, K. (2013). Social engagement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 examination of direct- and media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educated non-n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7*(1), 99–112.
- Knoke, D., & Yang, S. (202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ge.
- Lai, C. (2024).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edia activities on ethnic minorities' accultur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6*(1), 29–52.
- Lai, C., & Cai, S. (2023). The nature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ethnic minorities'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96*, 101852.
- Lai, C., Gu, M., Gao, F., & Yung, J. W. S. (2022).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of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with mainstream cultu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3*(5), 387–403.
- Lee, S. K. (2014).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in ethnic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n Korean immigrant's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3*, 289–303.
- Leurs, K., & Ponzanesi, S. (Eds.). (2024). *Doing digital migr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everyda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Lim, S. S., & Pham, B. (2016). "If you are a foreigne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stick together":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of migrant students. *New Media & Society, 18*(10), 2171–2188.
- Liu-Farrer, G. (2013). Chinese newcomers in Japan: Migration trends, profil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2011 Earthquak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2*(2), 231–257.
- Lu, W., & Hampton, K. N. (2017). Beyond the power of networks: Differentiating network structure from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f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9*(6), 861–879.
- Mitchell, J. C. (1974).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279–299.
- Ngai, P. B., Yoshimura, S. M., & Doi, F. (2020).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via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The Japanese students' experience with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US higher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31*(2), 228–243.
- Ong, A. S. J., & Ward, C. (2005).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measure for sojourners: The Index of Sojourner Social Support (ISSS) Scal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6*(6), 637–661.

- Redfield,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 J. (1936).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1), 149–152.
- Spiro, M. E. (1955). The acculturation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6), 1240–1252.
- Wang, X. (2020). *Chinese migrants' sense of belonging in Japan: Between digital and physical spa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Ward, C., & Geeraert, N. (2016). Advancing accultu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in its ecological contex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98–104.
- Wei, X., & Li, Q. (2013). The Confucian value of harmony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al interac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9(1), 60–66.
- Weng, L. (201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everyday life.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5(4), 622–627.
- Wimmer, A. (1997). Who owns the state?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3(4), 631–666.
- Wimmer, A. (2013). *Ethnic boundary making: 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mmer, A., & Schiller, N. G.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4), 301–334.
- Wong, M. L. L., & Liu, S. (2024). The rol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facilitating friendships and adapt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99, 101942.
- Xiao, Q., & Zhou, L. (2024). How face is perceived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 contrastive study. *Pragmatics*, 34(2), 264–292.
- Xie, M., & Chao, C.-C. (2022). The interplay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cultural adjustment: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media use of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2(2), 22–32.
- Yamashita, K. (2021). Chinese enclaves: Formation of new Chinatowns by Chinese newcomers. In Y. Ishikawa (Ed.), *Ethnic enclav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pp. 45–70). Springer Singapore.
- Zeng, L. M., & David, W. (2007). Adaptation to a sibling culture: The satisfaction and persistence intentions of Mainland Chinese postgraduate students at a Hong Kong University. *Asian Journa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3(1), 39–62.
- Zhang, Z. (2023). Exploring interpersonal harmon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eties. *Arts, Culture and Language*, 1(4), 1–5.

### 日文部分 (Japanese Section)

- 工藤剛治 (2018)。〈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文化〉。《千葉商大紀要》，第55卷，第2號，頁27–4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 Kudo, K. (2018). Japanese culture in Asia.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Review*, 55(2), 27-44.
- 井上恵 (2016)。「在日文系中国人留学生の就業動機と就職不安の関連」。《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第12巻, 頁217-229。
- Inoue, M.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motivation and occupational anxiety of Chinese non-science majors students in Japan. *Ochanomizu University Studies in Arts and Culture*, 12, 217-229.
- 毛新華、大坊郁夫(2006)。「中国の若者の人づきあいスタイルについての研究: 自由記述調査によるカテゴリカルな検討」。《対人社会心理学研究》, 第6號, 頁81-88。
- Mao, X., & Ohbo, I. (2006). Chinese young's human relations style: A categorical examination using an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Japanes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81-88.
- 守屋貴司(2018)。「外国人労働者の就労問題と改善策」。《日本労働協会雑誌》, 第696號, 頁30-39。
- Moriya, T. (2018). Issues with and improvement policies for foreign workers. *The Monthly Journal of the Japan Institute of Labour*, 696, 30-39.
- 李正姬、田中共子(2010)。「在日コリアン二世・三世の二文化環境への態度とメンタルヘルス(1)ー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自己認識に関する面接調査ー」。《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 第30號, 頁177-196。
- Lee, J.-H., & Tanaka, T. (2010). Attitudes toward a b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Korean-Japanese (1)ーSelf-cogni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an interview survey.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0, 177-196.
- 栗本英世(2016)。「日本の多文化共生の限界と可能性」。《未来共生学》, 第3號, 頁69-88。
- Kurimoto, E. (2016).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tabunka kyosei*) in Japan. *Mirai Kyosei: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Innovation*, 3, 69-88.
- 殷夢茜、青木紀久代(2017)。「在日中国人留學生の異文化適応に関する質的研究」。《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心理臨床相談センター紀要》, 第19號, 頁49-59。
- Yin, M., & Aoki, K. (2017). A qualitative study about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Japan. *Bulletin of Cent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at Ochanomizu University*, 19, 49-59.

- 稲井富赴代 (2012)。〈中国人留学生に対するキャリア教育と就職支援－日本企業に就職した元留学生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をもとに－〉。《研究紀要》, 第56–57合併號, 頁1–37。
- Inai, T. (2012). Career-building education and job hunting support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done on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who have found employments in Japanese enterprises. *Research Bulletin*, 56–57, 1–37.
- 趙師哲、田中共子 (2020a)。〈在日中国人の文化変容方略に関する探索的研究－留学後に高度外国人材となった9人における二文化への態度－〉。《多文化関係学》, 第17卷, 頁45–55。
- Zhao, S., & Tanaka, T. (2020a).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in Japan: Attitudes towards two cultures of nine highly-skilled foreign professionals. *Multicultural Relations*, 17, 45–55.
- 趙師哲、田中共子 (2020b)。〈中国系異文化滞在者の文化変容方略とメンタルヘルス：1990年代以降の欧米・日本・香港の研究から〉。《華僑華人研究》, 第17號, 頁56–67。
- Zhao, S., & Tanaka, T. (2020b).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overseas: Focusing on studie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Japan, and Hong Kong since 1990.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17, 56–67.

## 本文引用格式

- 王雨菲、張寧、朱曉宇 (2026)。〈族群之界與折衷策略：數字社交網絡對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影響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 第76期, 頁143–179。

##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 Wang, Y., Zhang, N., & Zhu, X. (2026). Boundaries of ethnicity and compromise strategies: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ocial networks on the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6, 143–179.